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發印委黨區南冀

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出版者：

發行者：

一九四八年十月出版

冀南新華書店

總店：威縣

分店：南宮 衡水

大名 臨清

初版——四五〇〇

目次

| | |
|-----------------------------|------|
| 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 (一) |
|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 (一一) |
|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效率與遠見..... | (一六) |
| 論主動與完成工作的才幹..... | (二四) |
|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 (三一) |
|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人員應如何工作..... | (三八) |

在批評和自我

批評的精神上培養幹部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鬥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計劃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而與共產主義的鬥爭裡？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位置。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地結果了社會發展的目的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地揭發，掃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地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嗎？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

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地更嚴肅地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的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地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地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裡，廣泛地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群眾，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演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人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地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的掃除缺點；有真正布爾什維克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

作鬥爭中來用布爾什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的。舊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缺點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蓋子來把它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麼，資產階級制度就是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類慾望互相撕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為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前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批評，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因為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來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麼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為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為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優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

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本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裡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裡。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在討論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個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作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作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給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公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分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大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

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分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委所發生的事情，証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理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就要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處罰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够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够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並且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絞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諱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把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

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作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工作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方法去實現批評的正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錯誤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為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着

的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裡潛藏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啟發群眾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能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群眾不僅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

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分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舖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什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黨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決缺點，而是報告領袖所做的工作，引証出很多統計材料。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將就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只揭發缺點而真正原因為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為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能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各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需要的不是所有其他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與原則性，就

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爲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蘊藏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爲它是不重要的，要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爲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領導者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使我們不能夠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聲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爲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問依據，沒有分寸地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辦法。

布爾什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煞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地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作爲它行動的方針，它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

的自尊心 and 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達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一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不可抹煞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樣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什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的檢查時，而來全盤的吹噓恭維，或是全盤地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阻礙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個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二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的提高領導集體農莊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由於黨的工作者在改善自己的工作上了第一次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讚頌，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驕就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太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

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喀己爲莫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什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地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越高，那麼，就要更高地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忽視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地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够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門中不斷的前進。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揭發我們可能性和準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線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的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葉群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聯共『黨的生活』二十三期社論）

檢查決議的執行程度

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

正確的政策是勝利的源泉，這是人所共知的。但是，這並不等於勝利的本身。勝利不是自己會來到的，必須加以組織，加以爭取。

斯大林同志對於政策路線與組織工作的相互關係，作出了典型的定義。他說：『在製定正確的路線之後，對問題已作出正確的決議之後，事情的成敗即決定於組織工作，人員的正確選擇以及對各個領導機關執行程度的檢查。否則，黨的正确路線與決議即會遭受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在製定正確的政策路線之後，組織工作即將決定一切，就是政策路線本身的命運——成功或失敗——亦不例外。』

布爾塞維克政策之所以能獲得連續的勝利，是因為黨經常以全部力量進行組織工作，以保証自己政策路線之實現。我們的黨正在進行着艱巨的工作——動員廣大人民羣衆完成共產主義建設的歷史任務。

列寧與斯大林教導我們：在組織工作中最主要的是選擇幹部與檢查執行程度。黨的組織只要遵循這一指示，就可以使布爾塞維克的領導方法在我國偉大建設的各方面都獲得進益。

目前所進行的黨的代表會議指出：黨的組織爲了提高戰後時期的經濟與文化，正在進行着熱烈的與全面的工作，發揮蘇維埃人民的偉大力量，他們的積極性與克服困難的堅定精神。黨的組織在全國人民中發起社會主義競賽，爭取五年計劃在四年內完成。在聯共黨中央對文學與藝術問題的決議頒佈後，各地組織即更加注意於思想教育工作的。許多黨組織都積累了對群眾宣傳鼓動的豐富的經驗。黨的幹部強固的掌握着布爾塞維克的領導藝術，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論水平。

但是，許多次的代表會議也指出了黨組織在領導工作方法上存在的嚴重的缺點。仍然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只注意於開會，準備決議與製成決議。而在決議一經製成之後，他們往往就會把這些決議忘得一乾二淨。製成的決議在實踐中會怎樣，所能實現的程度如何，是否所有的機構都已行動起來，遇到何種困難；需要採取何種補充措施以保證事情的順利進行——對於所有這些都不給以應有的注意。例如，乞卡洛夫州的黨代表會議指出：州黨委與某些區黨委減弱了對自己決議的執行程度的檢查。州黨委與區黨委對於決議的執行只倚靠着自己小團體的活動，未能發動黨內幹部與蘇維埃幹部以及廣大勞動群眾積極參加工作。在萬不得已時方派遣全權代表的辦法，在這種已成爲領導上的

主要手段。日常的細密的羣衆工作，對幹部的指導等時常是被無數決議的傳達與電報的拍發取而代之一。

這樣的領導方法會造成一種錯覺，即是：黨委會如能製成大量的決議，向各地發出許多電報，就似乎能表明它在工作中的確實有足夠的緊張。但實際上，黨的機關正是因為忙於這些工作而使自己不能廣泛並全面的推動事情的進程。這樣，也就不能充分發揮現有的提高全部工作的可能性。

布爾塞維克的領導原則要求：在製成決議之後即須計劃並規定方策以保證這一決議的執行。在一種情形下，需要派出一個或一組有經驗的工作人員至現地去。在另一種情形下，則必需給以物資技術器材的援助。總而言之，組織決議的執行，這就是說要發動黨與蘇維埃的無數幹部積極工作，由他們領導廣大人民克服困難，保證以布爾塞維克的工作速度完成國家當前的任務。與幹部們一起工作，給他們實際的幫助，指導他們，這是檢查的主要方面。黨委會的責任在於使工作人員明白他們所執行的任務的實質，使他們了解用何種方法可以更好的執行決議，最好是選擇何種組織形式方能增加黨發動羣衆的力量，保證黨組織當前任務的解決。

檢查執行程度是黨組織手段中最有效的武器。但必須嚴格遵守下述數點：

第一、對執行程度的檢查必須是有系統的，而不是插曲式的。就是說，在製成決議之後，不遲疑，不等待，立即督促決議的執行。黨委會必須了解該組織的日常生活，惟

有如此，它才能隨時隨地過問並在必要時糾正工作。這樣，對於執行程度的檢查方能隨時發現工作中某一段落的混亂並及時找出造成混亂的責任者。只有隨時並有系統的檢查執行程度，方能預防錯誤和缺點，也只有如此，黨委會方能適時的幫助自己的地方組織。檢查執行程度乃是黨組織以布爾塞維克責任心與紀律性教育幹部的有力武器。

第二、檢查執行程度不應該由次要的工作人員負責，而應該由領導人親自動手。列寧曾要求各組織，各機關的領導人必須將自己領導下的有經驗的，得力的工作人員「控制在自己手內，用以檢查實際工作之進行」，委託「某某人，到那裡去，視察，檢查，如果事情出漏洞就要你負責」。斯大林同志曾指示過：領導人親自檢查工作是能够使工作檢查發生效力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第三、檢查執行程度應該不只是根據形式的報告，而首先應在工作地點，根據工作的實際效果檢查之。

第四、檢查執行程度必須是客觀的，嚴格的。惟有展開對布爾塞維克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方能及時揭露缺點並製成糾正缺點的方法。檢查執行程度時對一切問題的解決不能無弊徇私。那裡發展這種非布爾塞維克的風氣，那裡就會產生不負責任的情形，跟踪而來的就是對國家利益的漠不關心與不忠實。對缺點應該不是掩飾，要展開尖銳的布爾塞維克的批評，不是寬容，要用嚴格的態度對待它——這是使檢查執行程度收效的一個重要條件。

檢查執行程度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本方法。檢查執行程度的結果可以反映出黨委會的全部領導作風，組織黨的積極份子，全體共產黨員、廣大勞動羣衆參加工作的能力。如果要加強對工作的督促與檢查，就必須改進全部的領導工作方法。

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工作的檢查如能組織良好，就會像探照燈似的，隨時隨地照明一個部門的工作情況，使官僚主義者與事務主義者暴露自己的原形。可以肯定的說：我們工作中十分之九的缺陷與漏洞都是由於缺乏組織良好的工作檢查而來。無疑問的，如果有正確的工作檢查，工作中的缺陷和漏洞大都可以避免的。」

黨組織的責任是對於決議執行程度的檢查工作加以積極的改進。而決議的本身則應確實符合蘇維埃人民爲執行其所擔負的偉大任務的要求。這就是我國經濟、文化生活與共產主義事業建設各方面的新的勝利的前提。

（常彥卿譯自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蘇聯真理報）

領導者的工作方法

西寧

——效率與遠見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乃是一個政治領導者的黨的工作人員所必要與應有的品質。沒有這種品質是不可想像的。

效率，乃領導者必要與應有的品質

效率應理解為：在實際上能夠實施黨的決定，及時採取實現黨的路線的辦法。一個講究效率的組織者，應有在一定情況中指示方針的能力，應正確而不耽擱地解決問題，及時採取必要的步驟來執行國家的計劃、任務、指令。這是以工作人員的經驗、知識與政治敏感來達成的。

列寧曾經說過：黨的組織與黨的領導者的意義，在於「爲了迅速與正確地解決複雜的政治問題，就要培養必需的知識，必需的經驗，以及除了知識和經驗以外的必需的政

治敏感」。不言而喻，有效率地、迅速地、不耽擱地解決問題，與急燥和草率沒有任何共同之點。這種急燥，常常引到放棄有決定意義的、關鍵的問題，代替以次要的、偶然發生的問題，而嚴肅的組織工作代替以空洞的例行公事。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高幹部，要他們「在解決複雜問題的時候，在全面地判定方向和全面的估計一切長短的時候，應當英明和不急燥」。

布爾塞維克的效率就是才幹。斯大林同志在黨的十七次代表大會上清楚地替清談家的工作者，替老實與忠誠地對待蘇維埃政權，但沒有能力領導、沒有能力組織什麼的人，畫了一個像。斯大林同志論這些清談家說：「他們動員起來了，把問題尖銳地提出來訂，他們有轉變，有進步，然而事情原封不動」。斯大林同志當時要求把那些可以讓任何活生生的事情沉溺在滔滔不絕的演說裡的不可救藥的清談家，從領導位置上撤職。斯大林同志說過：「在講效率的工作中，沒有清談家的位置」。

我們也有在講效率的工作中之另一種類型的不可靠的領導者。這就是不敢解決任何問題的領導者。他喜歡在與急燥作鬥爭的形式底下來拖延事情，喜歡在集體領導的形式底下開會。爲了避免解決問題，他總是裝着「想一想」、「商量商量」的樣子，然而過後他自己既不想也不同別人商量。在州黨委的實際工作中有這樣的情形：爲了糾正已發現的缺點，要採取有效的辦法，但是把問題推給黨委會議，並且也沒有準備考慮問題。這種「領導」通常引起遲延、緩慢，有時還引起缺陷。

工作中的效率要求。這確實的計劃、人力的正當分配、對執行情形的檢查、同被領導者的密切聯系。如果沒有製定能夠估計到主力軍與後備軍的適當計劃、沒有建立各種武器之間的互相配合、沒有規定精確的期限、沒有委任負責人、沒有對執行之周密與不斷的檢查；那麼有成就的進行軍事行動是不可想像的。同樣的，如果沒有計劃、沒有檢查、任何經濟活動和經濟工作中的成就、都是不可想像的。在戰爭中情況變化的場合、如果指揮上不見得靈活、對計劃不加以適當的修正、那麼部隊會遭受失敗。在經濟工作中，情形也是這樣。這裡也要求同樣的靈活性、創造性和真正的效率。

不言而喻，不僅在經濟領導的問題上，而且在黨內工作中，也要求效率。黨的機構的一切工作者，應賦有效率、敏捷、能動性。必須不拖延、不停滯地解決發生在黨委面前的問題。及時接受意見，迅速吸收共產黨員的創議，善於指導他們的活動，及時糾正工作人員——這一切是政治領導者的必須的義務。

講效率的具體方法

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在聽取依瓦諾夫和黨委工作報告後，曾經通過了決定。建議在黨的州委、區委與市委、縣黨委與經濟的機關的實際領導中，提倡講效率的工作方法。中央委員會把這個任務具體化了。什麼是講效率的方法？這就是：

及時解決問題。

不花費時間在不必要的會議上。

對通過了的決定之執行，施行嚴肅的組織工作。

分配負責執行具體的委託和任務的工作人員。

依靠真正了解確切情況者來研究問題。

及時揭露與糾正黨與蘇維埃組織中工作的缺點。

對黨與政府的決定與指令的執行，進行日常的檢查。

在進行農業運動時，對黨的工作者要求高度的效率。春季播種，照顧播種，穀物收割，穀物供應，秋季播種——這一切工作都帶有季節性質。在這裡如果缺乏效率、遲延，可以破壞全部事情。對黨的領導者，不僅要求為實行工作而定出好計劃，而且還要在情況中指示方針，在運動和執行計劃的過程中，作迅速的決定，熟習當地特殊性，看到現在的困難，並採取辦法克服困難。

現在地方黨的領導者，正埋頭於完成春季的播種工作。這裡有許多迫切的、完全必須的、不可耽擱的大小事情。播種之最迅速的完成，依靠於效率、實際辦法之及時採用、執行情形之日常與時刻檢查，對發現的缺點之立刻反應。這些黨的工作者要「不惜時間和精力」。

同時，正是現在而不是再晚些，應當最緊張的展開收割的準備工作。正如在冬天，就應當關心春季播種——修理拖拉機、選擇幹部等，與進行播種同時，就應當準備收

割——修理聯合收割機、農具、乾燥器、倉庫等等。

但是如果認為領導農業可以僅限於一個又一個的運動，僅限於播種和收割，那就錯了。黨的工作者應當看得更遠，深刻的看透經濟的規律。要熟悉集體農場的經濟狀況。分析材料，不要限於平均數字，而且要歸納其有機的組成部分。要會把今年的總結與去年的、許多年的總結來比較。這樣就可以看出發展的動力和趨勢，就可以看出長遠。黨的領導者可以及時干預、糾正事情、防止落後。

對於有些黨的與經濟的工作者，我們說他們是「講效率的人，是「消除缺陷的專家」。當然，排除缺陷是很大的藝術。可是做到沒有缺陷，及時預防缺陷，那是更大的藝術。

要領導，還應有遠見，對新鮮事物具有敏感。

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不僅要求及時準備當前的運動，而且善於看得更遠。應記得斯大林同志的話：「掌舵時要看。如果什麼也看不見，等到情況使我們遭了殃，那麼這就不

是領導。布爾什維克不是這樣了解領導的。要領導，就應有遠見」。

我們的幹部忙碌於完成城鄉經濟計劃的龐大的、當前的、有效率的工作。這個工作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只有脫離生活的人們才會蔑視它。然而同時如果完全埋頭於所謂「當前的工作」中，不理會作過的工作，不考慮工作的前途，那麼這是不可以救藥的罪

惡。生活不是按照一個標準前進的，日新月異，情況變化着，新的問題發生着，對新穎事物具有敏感的黨的工作者，應從此中作出適當的結論。

時常我們的工作人員陷於日常的當前的事務中，陷到這樣程度，就是自己失掉了思考前途的可能性，失掉了線索。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烏拉基米爾·伊里奇論建立蘇維埃領導機關的工作的一封信上曾寫道：必須「使自己擺脫雜亂無章，這種雜亂無章會葬送我們大家，要保證自己安靜地全面思致工作的可能性」。我們黨與經濟工作者要記住列寧的這些話，這多麼重要。

完全忙碌於當前工作的人，正是因為沒有從全面去思考工作，而意外的面臨着嚴重的缺陷。這種工作者時常滿足於局部的成績，一天的成績，一個運動的成績，而無視於在整個方面正在醞釀的落後。

例如，烏克蘭一些州的一些黨的工作者的情況，就是如此。他們為運動而運動的，表面地、不分析經濟地、不注意經濟發展趨勢地領導農業。一般說來，農業運動進行得並不壞，彷彿是完成了計劃。然而在烏克蘭像春麥這樣重要的農作物的播種，一年一年的減縮了。例如在波爾塔瓦州，春麥播種一九三七年為十三萬五千公頃，一九三八年為十萬八千五百公頃，一九三九年為九萬九千公頃，一九四〇年為九萬一千公頃。在戰後，一九四六年春麥播種大大落後於一九三七到一九三九年。波爾塔瓦州黨的領導者沒有分析農業經濟，沒有及時發現減縮春麥播種的有害傾向。其他的烏克蘭的工作者也犯了

同樣的錯誤。斯大林同志，聯共黨（布）中央委員會二月擴大會議，已指出了這一點。遠見的藝術，也是工業領域中黨的工作者的寶貴品質。一些工業中黨的與經濟的領導者不去看明天，不關心明天，滿足於已得的，因而失掉批判地估價經濟成就的能力，雖然這些成就有時是不鞏固的。例如，有些煤礦工業的工作者的特點就是如此。大家知道，採煤的成就是由於準備工作的及時進行來決定的。有時有這樣的情形，煤礦在幾個月期間，甚至一年之內，很好完成計劃，然後「意外地」破壞了計劃，而開採量的下降。檢查時發現了，當進行煤的開採時，經濟領導者與黨的組織不關心準備工作的進行，不看一看煤礦的明天。

這不僅指個別的煤礦，而且同樣指整個煤礦區。拿庫茲巴斯為例吧，這裡煤的開採曾經迅速增長，而在最近速度的增長猛降了。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庫茲巴斯是後起的區域，是在上面的礦層採煤的。爲了這個目的，規定了採礦的適當方法。然而情況變了。上面的礦層已不能供給我們所要求的煤的數量。需要轉向下面的、更深的礦層去。爲了這個目的，先前的採礦方法往往不能復用，需要以適合於煤礦的新條件的新方法來補充它。然而庫茲巴斯黨的組織與經濟領導者沒有預先考慮、研究和實驗這種方法。現在不得不匆匆忙忙進行這個工作。雖然現在地方組織有可能表現出應有的效率，但由於缺乏遠見而受的損失是很明顯的。

阿罕格爾州的木材工業的例子也有教育意義。阿罕格爾的州黨委第一書記尼古拉也

夫同志和州黨委，沒有注意本州主要的經濟部門木材工業的事務。他們很少到木材工業場和木材站去，同工作人員幾乎沒有什麼聯系，並且不清楚木材供給準備的真實情況。脫離了木材工業場的州黨委，沒有去解決阿罕格爾州木材工業進一步發展的根本問題；提高機械化、培養固定的工人幹部，提高勞動生產率；也沒有揭發木材工業部工作的嚴重缺點。

爲完成當前計劃的鬥爭，應與解決前途問題，與預防缺陷、不均、落後配合起來。如果黨的領導者不向前看，那麼領導的效率便失掉價值。

（伊譯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真理報」）

論主動和完成工作的才幹

斯列波夫

列寧把波爾什維克的黨稱為革新者的黨。它總是不斷地推翻和摒棄陳腐的事物，而對於建立起來的和檢查過的經驗，對於傳統，却始終是慎重的。黨經常研究人生的過程，觀察新的現象，發現新的要求與新的問題，並及時予以適當的解決。對新鮮事物的感覺，是列寧——斯大林型工作人員的高貴品質。

對新鮮事物感覺的表現，就是波爾什維主義的主動性。

衆所週知，集中領導是波爾什維主義的最重要的原則，遵守這個原則，就是嚴守紀律，明確地與無條件的執行上級機關的決定。然而嚴肅的集中領導，不但不排斥，相反地却期待着地方的創舉和主動。

波爾什維克黨，它的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是要求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發揮獨立的、才幹的、精明的主動。列寧說過：總路線的一致，在基本上，在實質上是不抵觸的，然而在「細部的工作上，在地方的特徵上，在處理工作的方法上，要能運用多樣的手法……」。

如果一個領導者願意成爲一個真正的波爾什維克組織者，就應該發揮廣泛的主動。捷爾仁斯基說過：『實行政策的總路線，無論經濟領導政策，或是一般的政策，應常有充分的信用，要負完全責任，並且要能發揮主動。不能拘泥於「一切照辦」的嚴厲命令中。』

無論多麼詳細的一道指令也不能顧及到各地地方所有的一切情形。這就是說，地方組織及其領導者應該展開普遍的獨立工作，要發揮主動，提出新問題，不能每件事物都等待上級的指示。一個政治領導者，不能藉口說沒有指示而不去做。

發揮主動——就是接受上級的指示如同出於自己的一樣，不是機械的，而是創造的對待它。人生是多樣的，複雜的。同一的指示在不同的環境下，就要變更其執行方法。活的、實際的工作能不斷地提出新問題；即或是一個舊問題在變遷了的環境下，也要經常用新的方法解決它。每一個波爾什維克領導者的任務——在實現工作中基本方向的節省人力物力的總路線時，要從周圍的一切事物中學習觀察與分析，學習尋找最好的辦法，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波爾什維克領導者應當吸收並利用過去經驗中的一切精華，善於在當前的具體的環境中，以創造的精神發揮積累的經驗，並且用它再來充實自己的經驗。

培養我們的幹部具有主動精神，需要提高他們對工作的責任心。列寧說過：管理和領導工作必須向『個人分工不明確的散漫性的統治，以及由此產生出來的完全不負責任

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規定每個工作人員負一定工作的專責，是造成發揮主動的條件。

逃避及企圖推脫責任的畏縮鬼們，不會發揮獨立的、大胆的主動，不會推進工作的。這類人很像塞德林小說中的別列德良金，他是本着「不哼不哈」的原則做事情的。可惜，我們之中還有一些工作人員，雖然相信手創之可貴並且能帶來利益，但是總想逃避責任，不支持自下而來的創舉與主動。

在群衆中激發創造性的主動、採納進步的創舉、可貴的發起並廣泛的普及它，精密的研究新出的萌芽並儘量幫助它們發展——這是波爾什維主義領導者的職責。

教育幹部具有英勇的創舉和主動——就是和傲慢自大、作威作福鬥爭。驕傲自大、大吹大擂其中必將引向自安自慰、洋洋自得、馬馬虎虎、喪失警惕的許多危險道路。而停滯不前、保守頑固、盲從祖先傳統——正和它們是一道的。

波爾什維克黨斥責以自己的過去而作威作福、停止創造性的工作、停止前進的工作人員。我們不應該忘記：只有健全的、不以工作成績爲滿足的、懷着不可遏止熱情前進而不停頓的地方，才會產生主動。斯大林同志教導我們：每一個蘇聯人每天都應把自己的工作做一個總結，大膽的檢查自己、批評自己的缺點，周密的思索怎樣才能使自己的工作達到更優良的成績。一個領導者更應如此。

波爾什維主義的批評與自我批評——是助長前進的力量。大膽和公開的批評會幫助

27

順利的克服工作中的困難與缺點。誰怕批評——誰就是遭人卑視的懦夫，對於他們改正缺點或是掩飾缺點都是無關重要的。列寧說過：『應該善於大膽的承認錯誤，爲的是和它作更堅強的抗爭』。

只有和群衆、和生活聯系密切的人才善於發揮主動。脫離群衆的、感覺不出人生脈搏的領導者，就不善於接受某一主動，更不會指示必要的方向。一個工作人員無論在任何崗位上都必須要和人民商議，考慮他們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教導過：領導者看事物單從一方面——從上，他們的視野是有限的。群衆看事物、事變，單從下面，他們的視野也在一定的尺度內，也是有限的。『爲了能正確的解決問題，需要把這兩種經驗團結到一起。只有在這個時候領導才能正確無遠』（斯大林語）。

波爾什維主義領導者必須珍重被領導人們的經驗。依靠群衆的工作人員，會使自己的經驗加上群衆的豐富經驗。他的指令和指示會變成洶湧的力量，因爲接受他的時候不像官僚命令，而是生活本身提示的措施。

我們不應忘掉主動是離不開實際組織工作的。最好的創舉，任何可貴的發起，如果得不到求實的、組織的工作的支持和保證的話，就會被腐化和消滅。讓我們來怎樣講那些死守着主動，而不想任何辦法來實現它，或是半途而廢的工作人員呢？我們有這類事實，而且不在少數。

舉一個例子吧！今年三月在斯莫連申市發起集體農莊建設者運動——他們必須在十

月革命三十週年前完成集體農民房屋的建設。這是具體的任務。但是區領導者們除了嘴皮上字面來說說寫寫以外再沒有作別的。譬如：羅斯拉里斯基區的領導者謝爾街爾且夫同志和庫波里雅諾夫同志連手指甲都沒接觸，還談什麼保證完成應諾的任務呢？此外，自從他們在集體農莊建設者區域會議上說了一些漂亮的話以後，根本就再也沒進會莊民房屋建設工作進行得如何。至於許多農莊的建築隊只在書面上存在，並不履行採取的職務，還值得可疑的嗎？

又如這麼一個事實。今春在坡爾塔瓦省發揮了很好的一種主動——決定在省內每座農莊修一架平常的晾穀台。甚至在省委決議中都記上了：「至一九四七年六月十五日在省內每座農莊裡修一架晾穀台」。然而省委工作人員並沒把工作做到底，並沒制定一個實踐的檢查，而使言行一致。

言行一致——這是組成波爾什維式領導的優良特點。波爾什維主義領導者的職責，是把一切工作都完成到底。

有時日常實踐工作和困難鬥爭時，會被外表形式和大吵大嚷給頂替。讓我們引証這麼一個例子吧！烏里揚諾甫斯克市組織爲了幫助農村，決定在市內企業中給機械拖拉機站裝備五十輛流動修理工廠。這是多麼好的發起呢！但是這一發起被非波爾什維克的處事態度給降低了價值。直到指定的日期爲止，只裝備了十輛汽車，並且後來查明其中有一半尙未修理。吵吵嚷嚷的愛好者便把這幾輛「汽車」弄到廣場上，召來一大批人，請

來了照像師、音樂隊，舉行了檢閱會！……過了一些時候，又裝備了二十五輛，又舉行了一次檢閱。「檢閱」的愛好者幾乎喪失了比重的感覺，甚至有個工廠給市內街道的圍柵製了一些鐵網時，也沒放鬆照像和音樂，請問，這裡還有什麼細心的日常組織工作可談呢！

主動不能容忍表面的積極和堂皇的形式。列寧和斯大林都責備過比任何人吵鬧得更歡的人，同時也責備了把這種吵吵嚷嚷當作動力的幼稚人們。跟着主動性必需有具體的工作，並且能和我們前途上所遇到的艱難作堅韌的搏鬥。

培養幹部具有主動精神，乃是精通馬列理論並在實際行動中能夠有創造性的發揮它的必要條件。沒有這個條件，工作人員就有變為區區瑣事事務者的危險。思想鍛鍊不強的人們在工作中會喪失前途和目的。正像斯大林同志所說：他們「認真的、不停手的搖槳，他們順水穩游，但是他們不僅不知道會被水送到那去，甚至也不願知道」。斯大林同志把這種工作稱為沒有前途、沒有方向和沒有目的的工作。

馬列主義的科學給予我們確立立場，發展我們的事業的力量，指出前進的方向，對工作的信心，並鍛鍊了奔向勝利的意志。而永世不朽的共產主義意志——正是大膽創舉與主動的洶湧泉源。

我們的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卓著成就在於他們為國民經濟、文化和管理機關所有各部門都培養出領導幹部，把他們教育得具有走向勝利的意志、達到目的頑強性和前進的熱

望。我黨所造就的波爾什維克幹部們，在自己的肩頭上擔負着社會主義建設的艱難困苦和愛國大戰的嚴酷考驗。他們光榮的勝任了。戰後和平發展的時期，巨大的新責任又落在我們幹部的肩上。爲了順利地完成這些任務，需要他們發揮「適宜於我們人民的勇氣、主動和智慧」(斯大林語)。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裡。

(烏藍汗譯自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真理報)

論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

朱可文。

在現在正在進行着的黨代表會議上，提出許多有關黨的工作方法的問題。被提出的問題中，有一個是關於黨的工作中的黨委制問題。

我們布爾什維克黨是社會的積極的改造者。它以幫助黨的、蘇維埃的及經濟工作的幹部，理解他們自己的經驗，用他們自己的經驗教導他們，幫助他們糾正和預防錯誤，教育他們如何組織群眾執行黨的指示。

如果黨的組織不去認真的集體討論問題，不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如果黨的機關與基層組織，與廣大的黨員群眾聯系不夠，那它就不能真正去領導。只有黨的領導幹部在黨員面前經常感到自己是對他們負責的，只有進行黨內民主及黨委工作制，開展自我批評，真正的政治工作幹部才能產生和發展。

在黨的實際工作中，有許多集體工作的形式，保證着廣大的黨員群眾積極參加決定問題及執行這些決議。黨委制則首先就是說集體制辦法，作決議。無論怎樣有經驗的領導者，就拿省委或區委書記來說吧，僅憑他一個人的經驗和知識也不足以從各方面都考

慮周到，以製訂此一或彼一問題之正確決議。斯大林同志說：個人的決定往往是或幾乎往往是片面的決定。

只有在全體黨委委員實際參加討論和製訂計劃的條件下，正確決定問題才屬可能。黨機關的任何一個決議，都應當依據多數人的經驗，它應當是集體創造的結晶。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缺少這一點，如果一個人就作決議，那我們就要在自己的工作中犯最嚴重的錯誤。正因為每個人都有糾正他人錯誤的可能，也正因為我們能接受這些糾正，我們的決議才能逐漸地正確」。

所以某些黨的領導者們，破壞黨委制決定問題的原則是不可容忍的。某一區委書記認為自己是行政管理者，他常常以個人命令和指示代替集體討論和集體決定問題。舉這樣一個例子，在列勞里新黨代表會上（阿爾泰特別區）代表們說，區委書記希洛夫同志不考慮黨委委員們的意見。或者舉這樣一個事實，烏里揚諾夫省密列吉斯區委書記傑民同志，處處剝奪區黨委委員的職權，不考慮普通黨員的意見。傑民同志經常個人決定問題，在成為事實之後再告訴其他委員。一切事情他都一把抓，他的基本工作「作風」是官僚包辦。區委委員們害怕破壞他們和第一書記的關係，默認了他的要不得的工作方法。不久前召開過的區委擴大會上，將這個幹部撤消了其第一書記的職務，是完全作得正確的。

這類不理睬集體意見的黨的工作者，因而就和黨內群眾對立起來，他們忘記了政治

領導人不是以行政權力而是以自己的威信、深思熟慮的提議去影響他人推動工作，而這是要靠處理問題的學識，善於聽取本機關團體成員的意見，說服他們，依靠他們來取得的。政治領導與行政管理工作不同，它要求領導者要盡許多的努力，具備較高的文化水平及善於團結幹部於自己的周圍的能力。黨的工作中的官僚管理除危害我們的事業以外，絕無其它好處。它不是表現領導者的力量而是表現他的軟弱。

領導上的黨委制，就是說，一個組織的全體成員都被吸引到積極緊張的工作中來。所以黨委開會時，如有多數委員缺席，那是不能容忍的。這種降低黨委作用的事實，在基洛夫市聯共（布）莫洛托夫區黨委會已經發生了。在這裡經常開多數委員不出席的區黨委會。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九日和二十五日開的區黨委會，七個委員只有三個出席。在這些會議上通過了吸收聯共（布）黨員，批准區黨委工作計劃，在勞動組合「阿爾其爾」（化學家）決定建立基層組織等這一些很重要的決議。另外一些專門問題討論會，也在多數黨委不出席的情形下召開過。在伊凡諾夫省卡佛里洛沃巴沙德區，還有比這更出奇的事，今年一月九日召開的區委會，只有兩個委員出席就開了。實際是區委書記阿洛夫同志一個人決定了所有的問題。

用徵求黨委意見的辦法通過重要決議的作法，是破壞黨委制的一種形式。例如聯共（布）摩達維亞中央局用徵求意見的辦法通過了以下一些決議：「黨領導共和國發展電力化的決議」，「關於中等學校教授倫理學及心理學的決議」，「關於固定共和國集體

農場及拖拉機站中農業專門幹部的決議」等等。暨定幹部住住也是徵求意見的方式。這類事實有許多其它黨的組織內也同樣存在着。

有些領導人認為，徵求意見通過決議似乎表現着領導的效能。實際上這種方法沒有任何效能，只不過是表現了對待問題的官僚事務主義態度。當然，某些無須討論的問題可以徵求意見決定，但是最重要的決議必須在集體領導的全體委員討論的基礎上通過。徵求意見的辦法破壞着黨委領導制，縮小着領導集團中每個成員們的職權，削弱着他們集體工作的責任感。

集體領導就是進一步，隨時地接近黨員，傾聽下級工作人員的意見，依靠黨的群眾的經驗。斯大林同志指示我們，領導者的眼界顯然是有局限性的，因為他們是從一方面，從上面觀察問題。相反的，群眾是從下面觀察問題。他們的眼界同樣也是有局限性的。『為求得問題的正確解決，必須結合雙方的經驗，只有這樣，領導才會正確。』（斯大林）

各個工作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參加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如果黨委會及積極份子會組織得好的話，它們就能使領導人運用這些工作人員的經驗，在布爾什維克批評的基礎上揭發缺點，給該組織的活動指出正確的方向。但是也遇到過這樣的事情，就是相當委擴大會及黨的活動份子會，降低到教訓領導幹部的學校的時候，這就必須糾正。這些會議不是每個地方都經常召開。如聯共（布）烏茲貝克斯坦中央全會，在一九四七年僅僅

開了一次。布列安斯克省伯熱采市委在去年十個月中也祇開過一次擴大會。沃洛諾克斯基區委保加爾及布列安斯克省其它區黨委的擴大會也召開的不多。在擴大會及積極份子會上的嚴肅地討論問題，有時為鋪張形式所代替，會議講台用來大演其講，而批評及自我批評則平靜無聲息。

黨委工作側要求領導人善於聽取全體委員的意見，考慮他們建議，勇敢地接受對自已缺點的批評。他不能認為批評指責有損自己的威信，不得把個人自尊心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斯大林同志說過：「善於集體行動，個別同志的志願準備服從全體的志願，這就是我們布爾什維克的真正勇敢。所以，沒有這種勇敢，不善於克服（假如你願意的話）自己的自尊心，並且服從集體的意志——沒有這些品質，就沒有集體，就沒有集體領導，就沒有共產主義」。

黨的領導人應該成為布爾什維克對待黨員批評及正常指責的模範。然而某些領導對批評兵刃相加，認為它是一對個人的侮辱，是「威信的損害」。在伏諾希洛夫的黨代表會議上，代表們在幹部問題上，對省書記也姆欽科同志，作了嚴格的適當的批評，他在自己的發言中打擊代表，並將幹部工作亂無頭緒的責任加在下級黨的工作人員身上。新西伯利亞市委委員布拉希列夫同志不承認對自己工作的批評，而斥責發言的代表，說他們似乎「無所事事，專以批評為能事」。

也有這樣的工作人員，他似乎同意批評，傾聽指責，表面上準備勇敢接受批評，但

在實際上，他不採取任何辦法，實行那些會議上提出來的問題。這種對待集體意見的態度，其實處並不亞於直接了當的不願考慮意見。二者結果相同：降低工作人員的積極性及其糾正錯誤的責任心。

黨委工作制度並不是說任何問題都要提到會議上解決，如果它不需要討論，也可以個別處理。在這些情形下，此一或彼一組織的領導人，不要害怕担负決定問題的責任。但是必須注意黨委工作制，集體討論並決定問題，絕不是取消，而相反地，要提倡每個委員的個人負責制。

列寧教導我們說：「……我們須要個人負責制，正如討論基本問題須要黨委制一樣，爲了及時解決問題，爲了不推脫責任，我們同樣需要個人負責制，個人處理問題。」辦事必須嚴格分清歸誰負責，必須與對待這一問題的模稜兩可、似是而非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不負責任的現象作無情的鬥爭。

爲使黨委領導制不流於空談和紙上談兵，每個黨委必須負起委託於自己的責任，嚴肅進行執行決議的組織工作。工作中還有這樣的黨委委員，他們在規定的時間內坐下來開黨委會，參加討論問題，並認爲這就是他們的全部責任。黨委全體委員的責任乃是關懷已通過了的決議之命運，不屈不撓的爲其實現而鬥爭。

集體領導的方法是黨的工作之基礎，它是培養黨的領導幹部的最重要的辦法。黨的積極份子愈是廣泛地參與黨領導機關的經常活動，它就愈能迅速的受到布爾什維克的教

育。現在黨組織面前的任務就是尋求完美的解決。破壞黨委工作原則應被視為是束縛黨員群眾的創造性及自動性的官僚主義的表現。

布爾什維克黨是在牢不可破的黨內民主的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我們的黨章規定了廣泛發揚每個黨員及候補黨員積極性的條件，最嚴格遵行黨內民主，黨委工作原則，使我們能够正確的培養領導幹部，幫助我們不倦怠地提高黨的組織，對國家的及經濟工作的布爾什維克的領導水平。

（張天恩譯自一九四八年三月六日「真理報」）

列寧論蘇維埃機關

人員應如何工作

。伏蒂也娃作。

新華社編輯按：這篇文章是從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一日蘇聯消息報譯出的，我們黨的、軍隊的、民主政府的和人民團體的一切能讀的幹部，都應好好研究這篇文章，並且用這篇文章中所說的列寧式的工作標準來檢查一下我們自己的工作。我們知道，毛主席和我們的黨中央，是經常要求我們按照這種列寧式的標準來進行工作的，而毛主席自己的工作作風正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好榜範。隨着人民革命戰爭的迅速發展，我們的黨和政府已經必須對成萬萬人民的日常生活直接負責了。我們的每一項工作中，是否存在着潦草、拖延、缺乏效率、缺乏紀律性，對群衆利益缺乏熱情和責任心等官僚主義現象，都會影響甚至決定人民的苦樂禍福和生死；向這種官僚主義作嚴肅的和反覆不斷的

鬥爭，以便把我們各方面的工作大大改進一步，是過去一年間和今後繼續整黨整軍和三查運動的重要目標之一。因此，現在發表和學習這樣一篇文章，是有益的和適合時宜的。當然，這篇文章裡所說的某些具體要求，在缺少新式交通工具的農村中，是不能完全實現或者是需要降低標準的。但是即令如此，我們也必須不把這些作爲藉口來原諒我們工作中的那些並非由此產生和並非不可能克服的一切不良現象。農村中散漫而停滯的小生產制度，乃是官僚主義蔓延的重要基礎和掩護物，這正是我們在農村環境中工作的同志們所應當警惕的。因此，我們應當更加注意地與經常地來進行反對官僚主義者的鬥爭。毛主席說：應當經常掃地和洗臉，以免這些政治的灰塵和政治的微生物來蒙蔽和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就正是指出了這種必要性。至於在我們同志進入城市以後，如果仍然保持着那些本來就必須堅定反對的農村式的官僚主義習慣，就更是不容容許的了。本文如下：

蘇維埃制度保證我國全體勞動者有最大的可能去參加國家的管理，列寧把這看作是我們國家機關底力量所在，認爲這是我們國家機關的活動有不斷改進的可能。列寧和斯大林所創立的蘇維埃機關是爲人民底利益服務的，爲鞏固我們社會主義國家底威力服務的。

列寧從蘇維埃國家存在的最初日子起，就非常重視改進蘇維埃政權機關的工作。他力求最大限度地吸引最廣泛的勞動者階層，自覺的參加蘇維埃機關底工作。

列寧非常重視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

一九一九年四月，列寧在給斯大林的短札中，談到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應如何工作時，

把下列幾項工作提到第一位，作為改組後國家監察人民委員會應負的迫切任務。這幾項工作就是四出調查民間的疾苦，與拖延現象作鬥爭，用革命手段與各種濫職作鬥爭。

列寧要求我們毅然決然地、迅速地、絲毫不苟地執行蘇維埃政府底法令和指示。

列寧警告說：『最小的非法行為，對蘇維埃秩序的最小的破壞，已經是一個空子，而為勞動者的敵人所馬上利用。……』

列寧在力求人們遵守革命法律時，嚴厲地同賄賂行為作鬥爭，他把這種行為叫做沙皇制度底、該咒詛的遺物。

一九一八年五月二日，莫斯科人民法庭會審幾個受賄者的案件。法庭証明了被告有罪，却判決很輕。列寧對這樣的判決，大發震怒，他寫了一封信，寫道：

『不把受賄者槍斃，而給以這樣開玩笑似地軟弱而輕微的判決，這對共產黨人和革命者乃是可恥的行為。這類受賄的同志，必須交給輿論裁判，並開除出黨……』

過了幾天，列寧寫信給司法人民委員會，在信上他建議道：『立刻趕快提出一個法案，規定對於賄賂（收賄贈賄以及其他賄賂行為等等）的懲罰，應該至少是十年監禁和十年苦役。』

列寧再三力求國家機關底精簡。要求工作上的巨大效率，並且堅決同那些以冷淡的

拖延與原來替活潑的工作作風的官僚主義者作鬥爭。

爲了要大家不致在牽涉國家利益的場合下，而且在牽涉個人利益的場合下，都嚴格遵守革命的秩序和法令，列寧曾進行了有系統的頑強的鬥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他寫信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說：

「我命令你立即把人民委員會管理處所收到的一切對政府機關及人員的控訴報告給我，其中書面的控訴限於廿四小時內報告，口頭的控訴則限於四十八小時內報告。」

「管理處對這些控訴應有特別的登記，同時對管理處辦公室主任應給以縝密的監督，以執行我對這些控訴的決定。」

檢查執行——「檢查實際上所做的事情」及善於挑選人員，這是蘇維埃國家機關在**工作上勝利的基本條件。**

列寧認爲，**「確切地劃定各個工作人員的職責，確定『每個担任蘇維埃任何職務的人』爲執行一定的明白而不含糊地擺在他面前的任務和實際工作所應有的明確責任。」**這是蘇維埃蘇埃國家機關工作的基本條件之一。

「不論對機關也好，對個別工作人員也好，列寧始終要求獨立和負責的工作。他尖銳地斥責那種對工作無能和不願負責的現象。凡是個別工作人員及機關，企圖把自己本來可以獨立解決的問題，提交給人民委員會或聯邦勞動國防會議去解決，他都堅決地與之作鬥爭。」

列寧向機關及個別工作人員一再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之一，就是要把每件事做到底，做到有實際的結果。

他再三教訓我們，要為完成所委託的工作而奮鬥，教訓我們不要停留在困難面前，不要援引阻礙順利工作的表面上的理由。他說：必須善於成十次地修正，成十次的重作，但是無論如何要達到自己的目的。開始碰了壁，那就重新再來，這樣一直到達到目的為止——列寧這樣教導我們。

他尖銳地斥責和嘲笑懶惰，粗枝大葉，對工作隨隨便便，對世上一切都喜歡沾一手，而又一事無成。

列寧向大家要求工作上的精確性、組織性和紀律性。他以自己的例子，表現了高度勞動修養底最好模範，表現了善於正確地配備工作，善於支配自己工作時間的本領。

誰也不像他那樣懂得時間底寶貴，並善於珍惜它。列寧沒有一分鐘是白白過去的，他從沒有表現過急躁，但他也從沒有拖延過。早晨，他總在一定的時刻來到，接見客人、主持會議、閱讀報告，並依據它們作指示，寫文章，指導當前進行的工作。而總是在正四點時回家吃飯和休息。他回到自己的辦公室是六點或五點半，總是充滿着精力和創造的積極性，一直工作到深夜。

列寧不僅善於珍惜自己的時間，而且也善於珍惜別人的時間。列寧領導下的會議，不管到會者有多少人，總是準時開會。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遲到委員底姓

名，按照列寧底吩咐，都登上了記錄簿，並且註明誰遲到了幾分鐘。如果無故一再遲到，列寧就斥責遲到者，警告說：再犯就登報。

列寧從不使那些在指定時間來見他的人們等候他。在稀有的場合下，當他同其他光榮的工作人員談論工作而不得不延遲幾分鐘時，他就在指定的時間把秘書叫來，要他去向等候的同志們道歉，請稍徵等一下。

有一次，在人民委員會開會的時間，列寧偶然經過彙報人的房間，看見整個房子塞滿了疲倦的人們，他們坐在煙霧迷濛中，有些在下棋，有些在看報，等着叫到會上去。

列寧馬上對秘書作了一系列具體的指示，要他排好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不僅如此，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三日，他給人民委員會管理處長一個書面的指示，要他週密地排好一個召集彙報人的次序，他寫道：

「現在彙報人一般總要等幾個鐘頭才被召集與會。」

「這是醜惡和野蠻。」

「必須做到使彙報人在一個一定的鐘點被召集。」

列寧所主持的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會議，都是在標本式的肅靜和全體出席者聚精會神之下進行的。這些會議對於蘇維埃機關底實際領導者，乃是真正的政治教育學校。

列寧在主持人民委員會及聯邦勞動國防會議的這些會議時，總是盡力使討論簡短，

使發言者諱語明白而且扼要。會議上的長篇大論，列寧認為是無謂地浪費時間。列寧也批評和責難長篇的書面報告。

對於這樣的報告，列寧平常是從後邊從實際的建議看起，如果發見這些建議是實事求是的，他才把整個報告看完。不管他所擔負的國家事業多麼巨大，列寧總找得出時間和精力來解決簡單的和細小的問題。

斯大林同志在列寧逝世第一週年紀念日發表於「工人報」的一封信上，指出了列寧底這個卓絕的特點。他寫道：「從來他不拒絕細小的工作，因為小事是大事的根——這就是列寧底重要遺訓之一。」

列寧把他自己的指示、要求、個人例子，同工作止的有修養的習慣和態度結合在一起，他慣於實事求是地和獨立地解決問題，慣於對所執行的工作負責，慣於把政府所通過的決議與法令確切和恰當地付諸實施。同時，在蘇維埃政權機關工作中，樹立起革命的紀律和秩序。他耐心而又頑強地鍛鍊了一批新型的國家工作人員。

列寧在其寫於重病時期（一九二三年一月二月間）的最後兩篇文章裡，再度專門論述創造模範的國家機關的問題。列寧在「黨缺毋濫」這篇文章裡指示道：

「我們應當如何要向自己提出革新我們國家機關的任務，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學習，第三是學習，然後就來檢查，使得科學在我們這裡不再是死板的教條和時髦的漂亮

話（用不着掩飾，它在我們這裡却常常是如此），使得科學實際地化爲血肉，完全而且真正地變成生活底組成因素。」

、自從列寧寫下這些卓越的話句之後，已經過去二十餘年了，我們偉大祖國底國家機關在這個期間，是大大地增長了，它的工作範圍是更加複雜了，更加艱巨了，更加多種多樣了。

蘇維埃機關勝利地執行了它在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和平時期中所擔負的各項任務。我們的國家機關在反對德國侵略者的偉大愛國戰爭時期，表現了特別高度的組織性、紀律和效率。我們各個經濟的和行政的人民委員會以及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在戰爭日子裡進行巨大而又困難的組織工作，並且保證了紅軍爲粉碎敵人所需要的切。

現在在愛國戰爭勝利結束以後，在新的和平建設時期，我們國家面前出現了新的巨大的任務，這就對我們全部國家機關底工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莫洛托夫同志說：『我們沒有比鞏固我們的勝利更爲重要的任務了，這個勝利是我們在不屈不撓的鬥爭中所取得的。這個勝利爲我們國家新的偉大的繁盛，爲我國人民在生活水平之進一步的提高開闢了道路。在我們面前展示社會主義建設如此規模宏偉的遠景，以及蘇聯力量如此巨大增漲的可能性，過去從來還不會有過。』

爲了執行這些任務，需要進一步改進蘇維埃機關的工作，使得它在新的和平條件下能工作得一個好的時鐘一樣，合拍而且準確。」（斯大林）（齊生譯、尊葆學校）

